

省委書記的避風港灣

北京地安門西大街38號

BEIJING DIANMEN XIDAJIE 38 HAO

大樹參天護棟梁，周總理心系保護任務，「文化大革命」中直招待所保護干部的作用，招待所和造反派之激烈較量



呂勤昭 口述
邢浩 整理

省委書記的避風港灣

京地安門西大街38號

BEIJING DIANMEN XIDAJIE 38 HAO

呂勤昭 口述 邢浩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38 号: 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 / 吕勤昭口述 邢浩整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218-09773-2

I. ①北… II. ①吕…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3006 号

BEI JING DI AN MEN XI DA JIE 38 HAO SHENG WEI SHU JI DE BI FENG GANG WAN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38 号: 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
吕勤昭口述 邢浩整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责任编辑: 陈娟

装帧设计:  书窗设计工作室

赵焜森 / 钟清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台山市彩宁纸品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 ISBN 978-7-218-09773-2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2.25 插页: 1 字数: 200 千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购: (020) 83781421

大树参天护栋梁（代序言）

曾宪新

这本书名叫《北京地安门西大街38号：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中国共产党的省委书记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是掌握一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权的地方大员，相当于过去的封疆大吏。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年轻朋友们一定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些手握重权的大员们有什么“风”可避呢？为什么要到北京来“避风”呢？如果说这本书是文学演义、是戏说历史，“避风”之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里记述的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这就不好理解了，不禁让人怀疑这里说的是不是确有其事！

年轻的朋友发出这些疑问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事确实是太奇特了，确实是不符合常规的“史无前例”。解答这些疑问的途径其实也很简单，只要简略地了解一下“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这些疑问就会冰释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呢？他公开表示是为了“反修防修”，即反对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防止修正主义者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有修正主义者吗？当时的回答是不仅有而且很多。他认为那些允许保留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存在、允许实行

自负盈亏、允许搞包产到户的，即所谓的“三自一包”，就是在搞“修正主义”“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而提倡“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物质援助要少的主张则是中国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

早在1964年2月，毛泽东就曾表示，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1966年5月中央通过的“5·16”通知里，他亲自写上“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样一句严重的判断的话语。

存在这么多的修正主义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该怎么办呢？当然不应让他们一路无障碍地发展下去，一定要打退他们的进攻，发动广大群众打倒他们，这就是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中央揪出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上行下效，各部门各省市也在炮打本部门本地区的司令部，揪出本部门本地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这样一层一层地揪下去，各部门各省市的领导们（除个别紧跟“文化大革命”风潮的人物）都在劫难逃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暴烈的“革命”。它叫“文化大革命”，其实一点也不“文化”，而是真正的武化。造反派们对被揪出来的各级领导，极尽其侮辱、摧残之能事，游街、抄家、戴高帽、弯腰低头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戴18斤重的大木牌子、关监狱、饿饭、有病不准医治……使这些被称为“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的人个个都有性命之虞。多少人受不了这种虐待自杀了，多少人致残了。

局面严重到这种程度，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提议要保护这些受虐待、受摧残的对革命立过大功的部长、省委书记们。给外地受冲击的省委书记们在北京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治治病，暂时避开冲击的浪头，于是“省委书记的避风港湾”一说便产生了。

其实，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等，事后查明，不过是和毛泽东本人存有工作上的不同意见而已。可是晚年毛泽东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①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把毛泽东“想整一下”的意图推向极端。在全国范围内，在党、政、军、群各个系统，大批地迫害和摧残干部。“文化大革命”一起，很短的时间内，一批知名的党和国家精英，便死于非命。先是邓拓自杀了，接着田家英上吊了，不久，老舍投湖了，张霖之被批斗致死……地方上更激烈，云南省省委第一书记闫红彦宣布自己是被江青、陈伯达逼死的，山西省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也被造反派宣布“畏罪自杀”，东海舰队司令、战将陶勇竟被人在一口枯井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这一件件、一桩桩血淋淋的事件，构成了那个年代的“红色恐怖”，这个恐怖背后显现着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蛇蝎心肠。

正是在这样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周恩来同志极其困难地却又极其坚决地挺身而出，出手保护广大干部。因为有毛泽东“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的意图在，周恩来才有余地、有可能、有成效地进行这场艰巨异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常的斗争。

周恩来同志保护干部的努力，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即：在各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党的干部政策，重申党内斗争的正确传统；尽心竭智、千方百计地缩小打击面，保护干部少受冲击、少遭摧残；利用有利时机，尽量快、尽量多地解放干部，使其站起来，重新工作。

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散布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周恩来特别强调对干部队伍要有个科学的正确的估量。

他说：“对干部队伍要有区别，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

他说：“不能说全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说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他说：“打击面不要过宽，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了。右派分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要打倒。”

他说：“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是不好的、不能依靠的，应当一律打倒。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不符合事实的。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概怀疑，一概否定，一概排斥，一概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要把干部一概打倒的观点，就是抹杀17年来的基本事实，就是否认17年的伟大成就。”

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混淆两类矛

盾、残酷摧残干部的罪行，周恩来义无反顾地强调一定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动不动就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搞成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他说：“我给上海市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但未说过他们一切都是正确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经讲过多次了。”

他说：“‘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毛泽东决定在“十六条”中不用“黑帮”“黑线”这个术语，是接受了周恩来和陶铸同志的意见。）

他说：“你们想想，全国党政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再一划，就划到‘三反分子’去了。要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

针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干部的罪行，周恩来既痛心又愤怒，他义愤填膺，坚持“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

他说：“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他们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

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反对绑架领导干部，说：“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年学美国‘三K党’的行为！”

他多次重申：“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这不是毛

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做法。”

他悲愤地说：“如果连一位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

他多次反对搜查、抄家、抓人、戴高帽、静坐这类行为。他告诫人们：“不可再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

二

周恩来同志在正面宣传党的干部政策的同时，就殚精竭虑、想方设法，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多种形式来保护干部。

从以下列举的几种形式中，就可以充分体会到周恩来同志保护干部的苦心 and 爱心。

第一种形式：以颁发中央文电的形式保护党内外干部

1966年8月29日夜，某学校的红卫兵抄查了章士钊的住宅。30日晨，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责令当即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8月30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 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 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 部长、副部长

(3) 政副

(4) 国副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

（李宗仁）

这就是著名的13人名单。这个名单经报毛泽东批准后，得以贯彻实行。

与开列这个名单的时间相隔不久，周恩来还给北京大学开列了一个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6人名单，即：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和美国教授温特。

1966年9月18日，周恩来为党中央起草电报，答复中共吉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关于被斗争干部的工资处理的询问，电报主要内容如下：

对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意见：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当看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中共安徽省省委领导被连续批斗的情况反映后，周恩来当即于1966年11月14日在“情况反映”上批示一定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批示说：

请陶铸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

批老干部。为保护这批干部，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指出，刘澜涛等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1966年11月24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谈到关于刘澜涛出狱问题：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1969年1月12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电报，指出九大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周恩来在电报中写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同志在内。你们已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并为他留出名额。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1969年3月31日，周恩来致毛泽东信，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内称：

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取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

当看到《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以后，1969年4月5日，周恩来在报告上批示：

拟同意送入302医院，进入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4月3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情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周恩来的这一批示，经毛泽东圈阅。

1969年5月4日，周恩来给国务院直属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转人大、政协军代表信，提出不要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内称：

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不知已否派去？如已派去，可与他们谈谈政策。

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

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附上邓初民先生一信，请加注意。

当看到华罗庚要求追查被盗手稿的来信后，1970年3月4日，周恩来给国务院直属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负责人和周恩来派到科学院的联络员批示：

首先，应给华罗庚以保护，防止坏人害他。
次之，应追查他的手稿被盗线索，力求破案。

再次，科学院数学所封存他的文物，请西尧查清，有无被盗痕迹，并考虑在有保证的情况下，发还他。

最后，华的生活已不适合再随科大去“五七”干校，或迁外地，最好以人大常委身份留他住京，试验他所主张的数学统筹方法。

此事请你们三位办好后告我。

1970年5月29日，周恩来致国务院直属口的军代表丁江信，说：

附上章行老一信，请阅。

马宗霍先生可仍返文史馆，任原职支原薪。

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两事办好后再告章老。

1970年7月31日，周恩来为国务院起草给煤炭工业部的通知。关于张霖之死亡问题，周恩来说：

国务院业务组于1970年7月31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1970年5月20日和7月31日两次报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专案组1970年5月17日的报告，同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1966年12月24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紧张状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

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澄清。

兹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1972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迫害。毛泽东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恩来立即于1972年12月18日给公安部、交通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负责人写信，指示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信中说：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信，提出应该让谭震林回来。他说：

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王良恩同志了解其情况，可问他关于震林同志一家的近情。

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

1974年9月29日，周恩来给王洪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信，这时，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周恩来在信中对参加国庆招待会名单提出意见。他说：

昨晚你交我国庆节招待会拟见报的名单，并告我主席已经一一听过，主席当即提出要加萧华、李力群、侯宝林3人，又问及商震是否列入。经政治局昨晚讨论，你告我遵照主席精神，又加刘志坚一人。昨晚我匆匆看过名单，便想到齐燕铭。

今晚又将2000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在第17类爱国人士方面，据统战部提出起义将领四夫人韩权华（卫立煌夫人）、郭翼青（程潜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夫人）、刘芸生（傅作义夫人）及张学铭（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因吕案解案被禁多年，去年已无罪释放）5人。我看，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至于张学铭，则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出席有此必要。

1975年5月25日，在重病期间，周恩来对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组织

爱国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的批示中，要求统战部的同志多采取民主协商的工作方式。批示指出：

此类参观人员，如尚未与他们协商就突然宣布，似仍应分别约他们座谈一次，取得他们同意后再定，以示我们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如因有人不去，而有人报名愿去，也可考虑加入适宜的人员去。统战部同志多采取这种工作方式，不要通知一下了事。

在第一类人士中，有年老体弱的，有业务不易离开需要经常参加会议的，如林巧稚、张孝骞、钟惠澜，最好征求一下本人和业务机关意见后再定。在第二类人士中，必有年老多病，不宜长途跋涉的，最好也与本人商量一下。

第二种形式：在群众集会上，公开点名保护，说服造反派不要冲击

这种形式的典型表现是对宋庆龄先生的保护。本来在那个著名的保护干部的13人名单中宋庆龄是第一名，本应保护奏效。但由于江青的干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自命不凡的江青，目空一切，完全以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当宋庆龄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时，江青立刻沉下了脸，结果不欢而散。报复心极强的江青，在当年11月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见到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时，完全像泼妇似的，伸手把书扔在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还一边踩，一边喋喋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题字！”同时大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

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仅只是于13人名单中列有宋庆龄，而是进一步在一次红卫兵集会上，强调应该尊重宋庆龄，他说：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新中国成立写

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3人姐妹3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第三种形式：派卫戍部队保障被批斗干部的生命安全

1966年12月初，江青、戚本禹策动一些人抓走了北京市市委彭真、刘仁、万里等负责人。周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卫戍区把人找回来，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北京卫戍区的同志遵照总理指示找回人后送到安全的地方保护起来。

在彭真同志被批斗时，周恩来指示要准备好部队，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生命安全的情况，立即把人抢救走。有一次，还亲自指示卫戍区准备一架直升机，以便出现生命危险时，可以立即运走。

罗瑞卿同志受审查时，周恩来交代卫戍区对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罗瑞卿同志被批斗时，周恩来向造反派规定：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准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走。后来还补充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

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周密安排，彭真、罗瑞卿同志在那场恶浪里，才有幸保住了生命。

彭德怀元帅被江青指使的人抓住要送往北京。为了彭老总的的安全，周